

# 家國之間： 白先勇的歷史書寫

• 翟志成

## 一 為先人的歷史挺身作證

現任台灣世新大學董事長及《傳記文學》社長成嘉玲教授，乃中國著名報人及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的掌珠、貨真價實的「名人之後」。她在為《傳記文學》2012年6月號「白崇禧將軍與民國」專輯撰寫〈編輯室手記〉時，曾慨乎言：「無論在自己的領域上有如何傑出的成就，做為名人之後，似乎有義務與責任在諸多的先人傳記與敘述中，傳續自己親歷或耳聞的見證，這也許就是所謂的宿命吧！」（成嘉玲：〈編輯室手記〉，《傳記文學》〔台北〕，2012年6月號，頁1。）成嘉玲把為先人的歷史挺身作證的「義務與責任」，看成是名人之後的「宿命」，語氣雖似無奈，但卻有無量之自豪從字裏行間滿而溢焉。

但倘若先人之人格被醜詆、先人之志業被歪曲、先人之功績被抹煞，替先人的歷史挺身作證，便不僅僅是名人之後的義務與責任而已。因為先人的負謗含冤，已構成了橫卡在名人之後咽喉上的骨鯁，不吐不快。古往今來，孝子賢孫以自己全副的精神生命，替先人滌蕩污垢、洗刷沉冤的案例可謂多矣。如果沒有乃孫岳珂的《顰天辨誣錄》，岳飛在史乘中很可能只是一個因驕奢跋扈而被皇帝處決的軍閥；他精忠報國的光輝志節、大破金兵的輝煌戰績，恐怕會永久深埋於歷史的灰燼中。又如果沒有陶斯亮的〈一封終於發出的信〉（《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0日、11日），



2012年初，白先勇輯成《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上、下兩大冊，在兩岸三地同時推出，引起了史學界的熱烈迴響。（圖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提供）

她的父親陶鑄只不過是無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澤東鬥死、磨死、整死的中共高幹中的一隻冤鬼；縱使日後獲得「平反」，也不過在長長一串的屈死者名單中又增添了一個名字，又哪能以自己的沉冤滅頂，撼動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心！

## 二 文學家白先勇

我在上世紀70年代中葉起便常在報刊雜誌上塗鴉。想不到這些對歷史國族的感懷，以及個人對中國大陸生活經歷反思的戲墨，竟引起了白先勇的注意，遂有幸與白氏訂交（白先勇：〈被斷傷的脊梁——讀翟志成《起來啊！中國的脊梁》有感〉，原載《中國時報》，1983年8月3日，收入《白先勇作品集》，第六冊〔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205-15）。1980年春，白先勇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語系任客座教授，而我恰好也正在該校歷史系博士班攻讀，遂相與過從甚密。我有幸見證了他撰寫短篇小說《骨灰》的整個過程。1980年夏第一屆《紅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舉行，白氏身為聖塔巴巴拉加州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當然是重點受邀的嘉賓；而會議主持人周策縱教授對後輩格外提攜，且與業師徐復觀先生為多年友好，故我雖然只是博士生，也有幸獲邀與會。

在會議期間，有一個在聽眾席旁聽的老先生，特別引起了白先勇的注目。老先生原是著名的醫生，中共立國時受了愛國主義的感召，毅然放棄美國的高薪厚俸而歸國，但在文革時卻被誣為美國特務，受盡了人所難堪的折磨和虐待。他的妻子當然不免飽受株連，但她不僅從未有過半句怨言，而且還常拚了命，以肉身抵擋紅衛兵往丈夫身上招呼的拳腳皮鞭棍棒。終於，她在一次兇殘的毒打中倒了下來，彌留之際，她祈求丈夫有朝一日帶着她的骨灰，離開這個不把人當人的國家……妻子的遺囑，成了老醫生咬緊牙關苟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文革結束後老醫生獲准赴美探親，他無論到了哪裏，都寸步不離地抱着老妻的骨灰，常喃喃自語：我不聽你的話，活該被紅衛兵打死！但為甚麼死的是你？你……為甚麼要捨命救我？

白先勇決定把老醫生的遭遇寫成小說。會議期間他曾幾次與老醫生深談，會議過後他開始大量研讀文革材料。由於他當時還未曾在中共治下生活過，大陸同胞許多的思考習慣和生活細節，尤其是文革時期畸形的語言暴力與變態的行為模式，他都千方百計地設法熟悉並加以把握，有時也會打電話向我求證——因為我畢竟在中共治下生活了二十年。已記不清有多少次，白氏剛寫好了一個開頭，毀掉了又換另一個開頭；寫完了一個版本不滿意，又再寫另一個版本；我在閱讀這些草稿時，既震驚於白先勇在虛構中求真的小說撰寫，竟要比歷史家撰寫論文還要認真、還要嚴謹、還要繁複，同時也開始擔心這篇小說甚麼時候才會殺青！當《骨灰》終於在《聯合文學》第二十六期（1986年12月號）刊登時，情節已大有改變，全篇不過萬字，而我已等足了六年。曹雪芹的《紅樓夢》，有「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之稱；白先

勇寫《骨灰》，雖還未吃夠「十年辛苦」，但也真當得起「字字看來皆是血」這七個字。白氏還和我談過，他很想把大陸崑曲表演家華文漪去國的心路歷程也寫成小說，卻一直未有消息。《骨灰》是白氏以共和國素材撰寫的第一篇小說，我當然相信它不會是唯一的一篇。

自晚清以降，中國由傳統社會的崩解向現代國族的建構逐步轉型。轉型期間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和文化因失衡和失序所引發的各種深刻危機，以及由各種危機衍生的改朝換代、政黨惡鬥、同室操戈、外患入侵，以及內憂外患對個體生命的戕害和撕裂，都成了白先勇每日反思、喟嘆和悲憫的對象。他的筆端，常帶有濃重得化不開的歷史滄桑感和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憂患意識，這是凡閱讀白先勇小說所不能不有的第一印象，歷來批評家對此評點可謂多矣。白先勇的同窗和文字知己歐陽子，就以滄桑與憂患為主要線索，寫出了一整本閱讀《台北人》的專書（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收入《白先勇作品集》，外集一，頁8-336）。《台北人》以劉禹錫的《烏衣巷》為序詩，卷首的題辭是「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以此為全書開宗明義。而《台北人》中的篇章，所雕所琢所刻所畫者正是一整個流亡在臺灣小朝廷的人生百態（白先勇：《台北人》，收入《白先勇作品集》，第二冊，頁1-306）。

白先勇採用文學的形象思維書寫歷史，早已人盡皆知，實毋庸再贅。但他不以此為滿足，更不以此為止境，他努力嘗試以歷史家的規範和學術路數書寫歷史。作為白崇禧將軍鍾愛的兒子，白先勇深信父親實有大功於國家民族，自覺無論於國於家，為公為私，自己都應責無旁貸地挺身而出，把海峽兩岸學界和文化界長期潑濺在白將軍身上的污泥墨汁洗刷乾淨。要根本推翻歷史的冤案，不能僅靠文學的曲筆，因為再好的小說，也只不過是旁敲側擊；而要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所憑藉的是扭轉乾坤的手段，必須要用史家的正筆，必須要結堂堂之陣，樹正正之旗。

### 三 歷史家白先勇

我認識白先勇不久，便知道他最希望能寫成的書，是他父親的傳記。我們之間的交談，自然也多圍繞着中國近現代的史事。最令他耿耿於懷的，是國共雙方都把白崇禧將軍醜詆為「軍閥」，而白將軍在北伐和抗戰的輝煌功業，也因共方的誣枉和國府的冷淡而湮沒不彰。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覆亡，也是白先勇談論的焦點。最讓他扼腕的，是四平街會戰中蔣中正不聽白將軍之言，下了一紙停戰令讓林彪得以敗部復活；而國府和台灣史學界常把徐蚌會戰兵敗的責任栽到乃父頭上，同樣令他氣憤難平。內子華瑋畢業於台大外文系，份屬白先勇的學妹，1983年白先勇離美赴台籌拍電影《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他在聖塔巴巴拉加州大學的課便由華瑋來代教，而他在當地的房子，也大方地讓給我們夫婦白住了大半年。由於多了這一層關係，白先勇與我更為熟絡。

1990年我到了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先後替白先勇在台灣各大學的歷史系物色過幾個學習程度甚好的研究生，並指導他們收集各種相關資料，為白氏撰寫白崇禧將軍傳記先做足準備。白先勇就自己最關切的問題，動筆率先寫出幾篇論文，作為傳記的鋪墊。最先寫成的〈徐州會戰 台兒莊大捷〉，發表於1995年7月7至11日的《聯合報》；另一篇〈「養虎貽患」：父親的憾恨〉，刊載於1999年11月至2000年1月的《當代》雜誌；最後一篇〈廣西精神——建設廣西模範省一九三一—三七年〉，刊登於2006年3月的《印刻文學生活誌》。差不多平均五年才撰成論文一篇，其辛苦艱難可知。

白先勇聰明絕頂，由文學家改換到歷史家的跑道，撰寫起史學論文也一樣有板有眼。若以專業史學家的標準來看這三篇論文，可以說是中規中矩，不過不失。我的同事陳永發院士和我治中共黨史都有數十年，最讓我們驚異的，並不是白氏撰寫與中共黨史相關的論文居然能符合史學的繩墨，而是他能運用文學家的想像力，推測蔣中正在四平大捷後發布停戰令的真正原因，主要並非屈於美國的壓力，而是一心以為共軍易與：此次不妨放過，不服下次再打（白先勇：〈「養虎貽患」：父親的憾恨〉，載《白先勇作品集》，第五冊，頁226-37）。這是我們這些中共黨史學者想不到也說不出來的，所以印象格外深刻。

然而，白先勇千辛萬苦撰成的三篇論文，在史學界並未能引起足夠的注意和重視。其中一個原因，是作為文學家白先勇的巨大身影，幾乎完全遮閉了作為歷史家白先勇的幼小身軀。但這還不是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白先勇以歷史家的身份撰寫自己父親的傳記，本來就沒有人會相信他能絕對客觀；而絕對客觀的魔咒，最先由乾嘉考據學揚波於前，再經過胡適等人所提倡的實證主義風行於後，已成為中國近現代史學的主流話語。由主流話語所產生的學術霸權，既嚴重地限制着中國近現代學者的思考和學術生產，同樣也嚴重地桎梏着白先勇的歷史書寫，讓他時時、事事、處處因為「白崇禧兒子」的「原罪」而縛手縛腳，欲說還休。這也是他的歷史論文寫得如此緩慢和如此艱難的根由。

#### 四 研究者與文本的內在對話

近十年來，白先勇成了振興崑曲運動的主帥，替父親立傳的事也就很少提了。這種變化，也明顯地反映在他打長短途電話到我家中討論的內容。撰寫乃父傳記時，他談話的主要對象是我，談的多是歷史；而近十年來他找的是華瑋，談話中總離不開崑曲，儘管他和我們夫婦同樣地稔熟。對於白氏來說，推廣崑曲是一種責任，但也是一種逃避——一種既要替父親作傳卻又無法掙脫客觀主義困境或陷阱的逃避。

梁啟超認為：「史家道德，應如鑒空衡平，是甚麼，照出來就是甚麼；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的主觀意見鏟除淨盡，把自己的性格養成像

鏡子和天平一樣。」然則，梁啟超所追求「鑒空衡平」的絕對客觀，既不可能，亦不可欲（參見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收入《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159）。

以現今詮釋學家的觀點，只有作者或讀者的精神生命與文本相契合，才更能發現、把握和成就真實。而二千多年前太史公在〈報任安書〉中再三強調的「發憤」，竟然與近世詮釋學的看法若合符節：「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收入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六十二，頁2735。）司馬遷所列舉的作品，無一不是天下一等一的大著作，也無一不與其作者的「發憤」息息相關。「發憤」既是主觀能動性的高揚，同時也是個人精神和生命的昇華。或許，我們還可以為太史公的說法再進一解：大凡第一流的人文作品，都離不開作者的「發憤」。

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馮友蘭、錢穆、唐君毅、徐復觀，都堅信中國歷史文化不僅有永恆的普世價值，而且還有非常重要的現代意義；都堅信對西方文化資源的借鑒和吸收，離不開中國的歷史文化的迎迓接引。前者是「守故」，後者是「開新」，構成了當代新儒學的最大共性。他們作品的字裏行間，均充斥着對當時「天喪斯文」的文化氛圍的不情願和不甘心，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存亡續絕流露出捨我其誰的責任感，以及扼腕攘臂而起誓為先聖先賢辯誣洗冤的義憤（參見馮友蘭：〈自序二〉，載《中國哲學史》，上冊〔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頁1-2；錢穆：〈莊子纂箋·序目〉，載《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六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13-14；唐君毅：〈序〉，載《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北：正中書局，1955〕，頁3-4；徐復觀：〈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結構及人治與法治的問題〉，載《中國思想史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5〕，頁134）。他們由「發憤」而撰寫的一系列煌煌巨著，已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無可替代和難以超越的新經典。這是任何人都否認不了的鐵一般的事實。

以上列舉的事例，說明了偉大的人文著述，離不開作者主觀的作用，「鑒空衡平」的絕對客觀是無法成就第一流的作品。如果馮、錢、唐、徐等人在撰文時追求「絕對客觀」，他們的作品要麼就寫不出來，要麼寫出來也會變成另一種樣子；如此一來我們在今時今日便不會再有當代新儒學的許多經典，甚至不會有當代新儒學這個學派。此外，成就第一流的作品，也離不開研究者與文本的內在對話（internal dialogue），否則研究工作便不能細緻和深入。徐復觀說得好：

由古人之書，以發見其抽象的思想後，更要由此抽象的思想以見到在此思想後面活生生的人；看到此人精神成長的過程，看到此人性情所得的陶養，看到此人在縱的方面所得的傳承，看到此人在橫的方面所吸取的

時代，一切思想，都是以問題為中心。沒有問題的思想不是思想。……所以治思想史的人，先由文字實物的具體，以走向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以走向人生、時代的具體。經過此種層層研究，然後其人其書，將重新活躍於我們的心目之上，活躍於我們時代之中。我們不僅是在讀古人的書，而是在與古人對話。（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及《莊老通辨自序》書後〉，載《中國思想史論集》，頁115-16。）

由此可見，內在對話亦離不開主觀的發明和察照作用，主觀之作用大矣哉！「絕對客觀」不能夠也不值得我們去追求，能夠也值得我們去追求的只是「相對客觀」。在相對客觀的語境中，要能做到不虛美、不隱惡、忠於事實、忠於自己的聞見。

## 五 結語

名人之後的身份，不僅不應是歷史書寫的魔咒，而且還是非常重要的資源。陳寅恪為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孫，自云「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識數十年間興廢盛衰之關鍵」，因而打算撰寫一書，「就咸、同、光、宣以來之朝局，與寒家先世直接或間接有關者，證諸史料，參以平生耳目見聞，以闡明之。並附載文藝瑣事，以供談助，庶幾不賢者識小之義。既不誣前人，亦免誤來者」，並斷言倘此書寫就，便可有「家史而兼信史」的性質（陳寅恪：〈弁言〉，載《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165-68）。史學大師的見解，畢竟高人不止一等。

順着陳氏的卓識，身為白崇禧將軍的哲嗣，不僅不應成為白先勇撰寫與白將軍相關傳記的「原罪」，這個身份倘若運用得宜，反而是至可寶貴且外人無可取代的重要資產。近年章伯鈞之女章詒和，充分發揮了名人之後的優勢，寫出了一本又一本「家史而兼信史」的傳記，洛陽紙貴，傳頌一時。2012年初，白先勇把白將軍相關的歷史圖片加上自己的文字解說，輯成上、下兩大冊《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在兩岸三地同時推出，引起了史學界的注目和熱烈迴響。該書之所以大受歡迎，主要是緣於白氏已掙脫了客觀主義的陷阱，不再企圖以歷史家的身份和純客觀的立場撰文，而開始從兒子的觀照如實地刻畫和描述自己的父親，為文真摯感人，並使自己的作品有了「家史而兼國史」的性質。

翟志成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名譽高級研究員，  
《新亞學報》主編。